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晚清外语教学研究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张美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晚清外语教学研究

Studies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张美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外语教学研究/张美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004-9528-4

I. ①晚… II. ①张…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888 号

责任编辑 孔继萍
特邀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97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近年来，张美平老师同我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2006年他去乌鲁木齐市参加第十二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时，又一次交谈甚多。后来，还让我陆续看到了他新的研究成果，感到十分高兴。今年夏天，他寄来了《晚清外语教学研究》（简称《教学研究》，下同）手稿，洋洋数十万言，并约我为之作序，更使我感动。

《教学研究》是张老师的一部重要专著。书中，他对于晚清外语教学史料，有深入发掘。对其教学发展缘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对于西学教育的发展及其“西学东渐”的阐述，对于晚清王朝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对其翻译的作用和影响，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笔者认为，像《教学研究》这样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在时下尤其值得一读。

《教学研究》全书共分八章，章节布局清晰，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近代的外语教学。具体地说，就是对中国晚清时期外语教学的启动，对官办洋学堂的外语专业教学和非外语专业教学，清末新学制建立后的“中学”外语教学、高等学堂的外语教学、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清末的留学教育、清末的西学翻译教学等诸多方面，都有认真的史料发掘和翔实的分析及研究。读后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实在为之振奋。

中国的外语教学历史悠久，典籍亦多有记载。如果从“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谈起，那是一时谈不完的。元世祖在元大都设立回回国子学、培养波斯语译官，明朝设“四夷馆”、教授周边国家和边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明末清初设立四译馆、专司翻译和外语教学，都是一时难以写尽的。因为历史上有不少外语教学资料，都湮没在各类各种文献堆中，是值得有关机构和专业人员来系统整理的。但是一贯勤

奋治学、善于钻研的张老师，却敢于抓住这个主题。他就是对从 19 世纪开始至 20 世纪初清廷灭亡时为止这段近百年晚清历史时期的外语教学进行了畅所欲言的系统研究，展示了晚清另一侧面波澜壮阔的历史及其艰难发展的显赫成绩。这可称得上是中国外语教学史上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关于晚清外语教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

大家知道，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教育，是关门在私塾、书院或官方筹办的各类学府里，首先给学子们传授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史知识，然后通过科举考试才逐步进入仕途。即使到了明朝万历年间，有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来华，也须首先学会华语才能传教，基督教亦须比附儒家思想，才能用西方的科技来吸引当时的社会贤达。这只是他们“采用化基督教义为儒家思想的方法”，也只是西方人以自己渊博学识去结识和影响东方人的一种做法。但是，到了 19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扩张加剧，西方传教士受教会派遣大批来华，在沿海一带传教日渐活跃起来。1818 年，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创办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文化，这是第一所教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学校。1839 年，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School）在澳门正式成立，这也是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爆发，184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帝国政府获得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中国门户大开。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机，西方教会势力源源不断地派人来华，竞相设立教会学校。到 1860 年之前，仅基督教新教在我国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就开设各式学校 50 余所，学生上千人，其影响日渐扩大。

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1860）结束以后，清王朝的中央和地方实力派官僚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了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开办实业，兴办学堂，培养人才。他们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指导之下，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相继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全国重要城市开办了数十所包含了三种类型的“洋务学堂”，即分设外国语学堂、科技实业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希望被挑选的中国学子在这些“学堂”中通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促进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例如，1862

年主持朝廷涉外事务的恭亲王奕訢（1833—1898）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1863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上海同文馆”（1867年改称“上海广方言馆”），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1812—1885）在福建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1881年已是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又于天津创办“天津水师学堂”，1893年当时的实权派人物张之洞（1807—1909）在武汉成立“湖北自强学堂”，1895年时任直隶海关道的盛宣怀（1844—1916）创办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凡此“洋务运动”中，各种“馆”、“堂”、“学”府的先后设立，开始了旧中国新教育、新学制的发展历程，呈现其与当时私塾、书院等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课程设置与课堂教学的实用性特色。

例如，京师同文馆五年制和八年制课程设置，不仅表现出以培养翻译和对外交涉人才为根本宗旨，重视口译、笔译实践活动，实行学用结合，认真执行考核内容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的严格考试制度，而且使京师同文馆成为19世纪中叶由洋务派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官办外国语学校，也是近代中国开始努力向西方学习而迈出的第一步，真可说是我国外语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集外语与近代科学教育于一体的新式外国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第一所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湖北自强学堂，从“西语”到“西艺”转变的福州船政学堂，到新学制建立后的中学外语教学——集基础、中等教育于一体的上海南洋公学，近代第一所大学意义上的天津中西学堂、新型正规大学的肇端——京师大学堂，以及清末教会学校外语教学的发展、留学教育与西学翻译，尤其是京师同文馆的西学翻译、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学翻译、清末传教士的西学翻译，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历史资料，都留下值得回眸的思考。因而，美平对此的思考态度和研究方法，也就特别引人注目。

其一，如何看待洋务运动和所创办的洋学堂及其所开设的外语教学科目，似乎仍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20世纪50年代在牟安世所著的《洋务运动》一书里认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的运动。”60年代后，姜铎、黄逸峰两位学者曾为洋务运动翻案，认为应该坚持两点论，即“不能不在客观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文汇报》，1961年11月），却又不能称之为进步运动。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于1979年掀起了新的讨论，甚至有人“高高举起洋务运动全面进步论的大旗，把洋务

运动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并列，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大进步运动”。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出版的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中，对洋务运动评价上，却采纳了姜铎的两点论。“耐人寻味的是”，第二届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1983年）在上海举行时，黄逸峰已病重，未能出席。而出席会议的姜铎却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是反对洋务运动全面肯定论的“保守派”（见刘永峰，载《看历史》2010年第11期）。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教学研究》作者张美平老师在书中放开笔墨描述了洋务运动的一系列权势人物支持和创办洋学堂、支持和设置新学科、支持新学制建立后的外语专业教学、中学外语教学、大学外语教学、支持并发展清末的留学教育、派遣学生留学欧美，包括“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等一系列内容来看，似乎作者也在强烈地吸引我们来进一步探讨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

其二，《教学研究》书中的研究方法也涉及了方法论研究课题，是唯实、求真的具体体现。

人们研究近百年前的晚清外语教学，就要返回到晚清历史时代中去。不能用今人的思想去套用和要求历史事件人物。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又是一个常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例如，把洋务派一律笼统地称为“卖国贼”，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是务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如果要求晚清时期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是为挽救清政府的生存而做事，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从《教学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就拿作者对教会学校外语教学的剖析来看，也是很实事求是的。因为，当时的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与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类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传布福音的传教人才。学校开设的汉语课、英语课，不是纯语言学习的目的。课堂里虽然也宣传了科学、医学知识，其社会作用仍是十分有限的。在1900年前，教会学校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双轨并行，这是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难以避免的必然现象。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新学制的建立、旧科举制度的废除，并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纳入中国教育体制。这是我们和子孙后代都不应该轻易忘怀的一段历史。作者一开始就肯定其“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同时，又立即提出要对其有“清醒的认识”，并引用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回忆录》中的这段话来道出自己的学术观点：“教会学校

培养中国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国家的需要，而是出自满足教会活动的需要。他们在普及教育方面所愿意做的工作主要是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个人谋生做好准备，而并未顾及或根本未意识到整个国家的需要和要求。”

能真正顾及国家需要的，还得靠中国人自己。中华民族的无数优秀儿女，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胜利后，让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年林则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容闳、詹天佑等大批回国留学生也是这样做的。无数的中国仁人志士亦是这样从未忘记过自己肩上的重担与责任，这些教育界的前辈们，也永远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其三，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添了我们学什么和如何学的新思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一直是我国教育部门长期关注的热门话题，至今仍然是一个牵动千家万户的热门话题，也是得到党和国家最直接关心的热门议题之一。因为，“强国必先强教”。“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胡锦涛主席 2010 年 7 月 23 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在研究工作中也很有指导意义。

当我们在研究晚清外语教学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回顾历史。历史上，我们总是跳不出“急用先学”这个圈子。当然，这有我们自己的国情。当清廷在危亡时刻要与“洋人”谈判，连一个懂外语的中国译员都找不出来，而要由外国人来充当翻译时，这只能是加重了丧权辱国的处境；当国家科技落后，自己无法生产国家急需的产品时，也只好急用先学，这就是无法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当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财力有限，也一时不得不急用先学。但是，今日中国正在昂首阔步登上国际舞台，中国人民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学什么和如何学，就应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用战略眼光来安排一切了。

大家知道，我国自晚清和民国以来，教育战线上就一直存在着弄清办学宗旨、寻求资金来源、挑选生源情况、解决师资选聘、设置教学内容、商讨教学方法、培养新型人才等种种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方法，可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因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当时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现在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我们的国力也完全不同了，我们充分懂得了“教育对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培育人才具有基础性

作用”。所以，我们有百倍的信心和决心，“要紧紧抓住机遇，要努力迎接挑战，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充分发挥教育的重大作用”。

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凡值得我们学的，我们都有必要学习。中国的优良文化艺术，凡值得弘扬的，我们也有必要选送出去。我们重视外语教育，就是重视内外的交流。住在同一个“地球村”的文明人类，是永远需要交流的。“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胡锦涛）。这一充满了哲理的讲话，包含了东方人的智慧。对“明天”更自信的炎黄子孙在研读晚清外语教学那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会有点尴尬或仍会带有伤痛，但这也更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崛起，更加珍惜今天、创造明天。

我们知道，《教学研究》一书的作者张美平老师，是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副教授。不久前，他曾作为中山大学访问学者，在王东风博导的带领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修工作。回原单位后，在继续担负着繁重教学任务之余，仍坚持勤奋研读，笔耕不辍。该著的完稿，也就是他勤于学习、善于钻研的具体体现。还应该指出的是，作者文献基础扎实，在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在史料梳理上，严肃认真。全书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剖析深化。作者把立论和剖析植根于当时的外语教学土壤和丰富的翻译实践基础上，显得脉络分明，论证缜密，很有深度，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的研究著作。

综上所述，笔者在读完《教学研究》之后，深为全书的丰富内容而兴奋，认为它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学术界同行的一件喜事，值得我们共同庆贺。

是为序！

李亚舒

2010年10月17日于中国科学院

目 录

第一章 早期的中国外语教学	(1)
第一节 早期教会学校概览.....	(3)
第二节 外语教学的先声——马六甲英华书院	(15)
第三节 早期外语教学的开端——马礼逊学校	(28)
第二章 中国新教育的启动:官办洋务学堂的外语专业教学	(40)
第一节 近代中国外语教学的肇始——京师同文馆	(43)
第二节 集外语与近代科学于一体的新式外国语学校 ——上海广方言馆	(75)
第三节 第一所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 专门学堂——湖北自强学堂	(99)
第三章 官办洋务学堂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学	(117)
第一节 从“西语”到“西艺”的转变——福州船政学堂.....	(119)
第二节 “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 ——天津水师学堂.....	(138)
第四章 新学制建立后的中学外语教学	(155)
第一节 新学制系统的建立.....	(156)
第二节 新学制系统建立后的中学外语教学.....	(162)
第三节 集基础、中等教育于一体——上海南洋公学	(188)

第五章 高等学堂的外语教学	(199)
第一节 高等学堂外语教学的肇始.....	(200)
第二节 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天津中西学堂.....	(215)
第三节 新型正规大学的肇端——京师大学堂.....	(224)
第六章 教会学校外语教学的发展	(236)
第一节 教会学校外语教学的发展及特点.....	(237)
第二节 关于外语教学的争论.....	(252)
第七章 求新知于异域:清末的留学教育	(263)
第一节 近代中国留学的先声:前辈们的留学足迹	(264)
第二节 留学教育的发轫——幼童留学美国.....	(268)
第三节 “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 ——福州船政学堂学生留学欧洲.....	(293)
第八章 西学东渐:清末的西学翻译	(313)
第一节 传教士的西学翻译.....	(315)
第二节 京师同文馆的西学翻译.....	(329)
第三节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西学翻译.....	(342)
结束语	(352)
参考文献	(361)
后记	(371)

第一章

早期的中国外语教学

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夷情备采》中说，“中国人以欧罗巴为夷，皆由不通欧罗巴之语言文字，是以于麻六甲设书院教师，以教化中国之人”^①。在麻六甲^②设立的书院，系英国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于1818年在南洋马六甲创办的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该书院对华人实施英语语言文字教育，被认为是远东地区最早的为中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因此，从时间上说，近代中国的学校外语教学可追溯到鸦片战争（1840—1842）前建立的教会学校。^③除英华书院之外，还有美国传教士

① 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仲夏，古微堂聚珍版，第6页。

② 今译马六甲。

③ 中国外语教学历史悠久。许多典籍中便有一系列关于与周边国家（或四方部族）交流及翻译官员的记载。“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明）林尧俞等纂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九，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78—679页。〕郑玄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而“象胥”一职在周朝就有了。（同上书，第676页。）但是，对于那时候人们的外语学习和以培养翻译官员为目标的外语教学活动，可惜没有可靠的史料记载。于史有征的外语教学活动，以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的回回国子学为最早，这是培养波斯语和“亦斯替非文字”（一种使用领域有限，用于政府之间财务税收、记账等的文字）译员，以备政府各部门使用的学校。其后，则有明朝的“四夷馆”，主要从事培养专门翻译、教授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语言文字。明末清初有四译馆、会同四译馆，专司翻译和除汉语外的各语种教学。再往后至俄罗斯文馆，这是培养俄语翻译以满足当时中俄之间交往需要的学校。而我国英语教学的开始时间相对较晚，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英、美传教士在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创办的教会学校。因此，本研究考察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初开始至20世纪清朝覆亡为

裨治文 (Elijah Bridgeman) 和雅裨理 (David Abeel) 于 1830 年在广州创办的一所男塾——“贝满学校” (Bridgman School)^①, 英国“伦敦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古特拉富夫人 (Mrs. Gustzlaff) 在中国澳门开办的一所学塾以及由英、美等国侨民出资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校 (The Morrison School), 等等。但是, 这些教会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管辖, 游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 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其英语教学不能算是中国外语教学的开端, 至多只能算是中国外语教学开端的催化剂。^② 然而, 英华书院等学校的创办, 开始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教育活动的历史, 培养了袁德辉^③ 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

中国教会学校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产生和发展的。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 它是一种与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质教育体系。早期的教会学校, 大半集中精力于传教士之培养, 于语言 (汉语、英语)、科学、医学方面, 虽有贡献, 却很有限。这些学校中, 以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为最著名。1900 年以前, 教会学校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双轨并行, 互不干涉。直到 20 世纪初期, 新学制建立, 科举制度废除, 并经历了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 教会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纳入中国教育体制。从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 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教会学校全部被撤并和接管, 教会教育在中国存在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在这近一个半世纪里, 教会教育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

止。关于 19 世纪初期以前的外语教学情况, 可参阅高晓芳《近代以前的外语教学小史》, 载《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第 20—60 页; 孔慧怡《历朝政府的翻译活动》, 载《重写翻译史》,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2005 年版, 第 126—139 页; 季压西、陈伟明《同文馆前明清外语学习机构》, 载《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 (三) ——从“同文三馆”起步》, 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32 页。另参阅相关刊物的专题研究。

① 相关情况可参见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9.

② 近代中国新式的外语教学以 1862 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为肇端。但是, 京师同文馆成立前的几十年, 这些在中国本土香港、澳门、广州等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开展的英语教学活动大多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零星地进行, 除少数学校外, 规模极小, 是一种非正规的、不系统的教育。

③ 林则徐的首席英文秘书。有关袁德辉的详细情况, 参见季压西、陈伟明《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 (一) ——中国近代通事》, 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19—323 页。

远的影响,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对教会学校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学校,并不是真正地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而是自有其目的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888—1985)说得好:“教会学校培养中国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国家的需要,而是出自满足教会活动的需要。他们在普及教育方面所愿意做的工作主要是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个人谋生做好准备,而并未顾及或根本未意识到整个国家的需要和要求。”^①

第一节 早期教会学校概览

中国传统教育一向是在私塾、书院或官办的各级学校中,传授儒家学说和传统的文史知识,然后通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进入仕途。这种教学方式,一直延续到1904年开始的新学制改革才宣告结束。19世纪初出现的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给清朝这个古老、封闭的封建老大帝国吹进了一股清风。

一 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

西方传教士来华可追溯到唐朝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传入,经历了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罗马天主教及清代的基督教新教四个时期,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在鸦片战争以前,多次遭受禁教^②,传教事业遭受挫折和长期停顿,但仍为教义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2页。

^② 早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广义的基督教即开始传入中国。但其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其于史有征的,可追溯到唐贞观九年(635)“景教”的传入。是年,东罗马帝国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主教阿罗本(Olopen)来到长安并开始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名曰“景教”。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殃及景教等外来宗教,景教在中国内地不复存在。1294年,罗马教皇特使约翰·孟德高维诺(John de Monte Corvino)抵达汗八里(今北京),标志着天主教(亦称也里可温教,Arkaun)正式传入中国,但随着元朝的覆亡,天主教的发展也随之中断,一直到16世纪后,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与西方殖民政策的影响,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展才又逐渐兴盛起来。明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中国传教,并于次年在广东肇庆建立传教会所,天主教于是逐步深入中国,并在内地扎根。

与发展作出了一定努力。尤其是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 (Matteo Ricci)、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等人, 他们谙熟华语, 身着儒服, 出入宫廷, 以基督教义比附儒家思想, 以西方科技吸引当时的明达之士, 如徐光启 (1562—1633)、李之藻 (1565—1630)、王徵 (1571—1644) 等, 从而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他们对开启我国人民的智慧、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他们“采用化基督教教义为儒家思想的方法, 只是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去结识和影响他人, 在学校教育方面未闻有何建树”^①。

虽然开始于 16 世纪末的“西学东渐”因中国的禁教和闭关政策而停止, 但西方向东方扩张之势有增无减。19 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展, 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兴盛。其时的中国, 海禁未开, 西人传教活动仍被严厉禁止, 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传教士受不同宗教组织的派遣秘密地来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罗伯特·马礼逊。^②他于 1818 年创办的英华书院是按照英国模式首先在海外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 是一所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学习英语的学校。书院总括小学到中学的课程, 同时使用中文和英文进行教学。^③马礼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第一次完整地把《圣经》译成中文, 印刷成册, 并广为散发, 从而使在华传教有了依据和统一标准, 也使中国人能更容易地接触和理解基督教义。1834 年, 马礼逊病逝于澳门。时人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去世, 于 1839 年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 (Morrison School)。这是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第一所

明末清初, 天主教在中国得到顺利发展, 神职人员像汤若望、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等, 都受到朝廷相当的礼遇, 甚至被封为朝臣。但由于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矛盾和冲突, 再加上是否允许中国教民祭祀孔的礼仪之争, 导致了从康熙五十九年 (1720) 开始的百年禁教。雍正元年 (1723) 开始, 禁教得到进一步强化, 开始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挫折。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 (1842) 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才开始解禁。此后, 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政治及军事干预, 天主教及新教在中国得到快速的发展。

①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 余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清代 (下),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75 页。

② 关于马礼逊的生平, 详见 Lindsay Ride: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7; *Life of Dr. Morris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 (2), 1841, pp. 25—37.

③ 详见本章第二节“外语教学的先声——马六甲英华书院”。

具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①

二 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184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又叫《江宁条约》),英国政府获得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并且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②。这就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敞开了大门,而这一条约的起草者系最早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Morrison)。1844 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其中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许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处。”^③ 条约起草者为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伯驾(Peter Parker)。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自今以后,凡佛兰西家眷,可带往中国之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市埠地方居住、贸易,平安无碍,长川不辍。”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员毫不得刻待禁阻。”同年,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这些条约都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法律保证。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传教规模,人数也日趋增多。

在 1860 年之前的 20 年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遭遇接二连三的失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对在中国成功地从事传教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全改变了先前禁教的状况,外国人在华传教合法化,并且允许他们原先只在通商城市,后在中国任何地方随意建造教

① 详见本章第三节“早期外语教学的开端——马礼逊学校”。

② 转引自王嘉弘《从李春生对进化主义的反驳看其在近代思想史的定位》,《台湾东海中文学报》2007 年第 19 期,第 280 页。

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54 页。以下出处相同,第 58、97、107 页。

堂、医院、学校以及房屋等。^①

1842年,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次年在香港正式开学,仍由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担任院长。1843年起,香港这个有许多外籍人士居住的西方化城市,十余年之中就已开办各种学校约10所,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学校,开一代风气之先。初期教会学校都实行男女分校。教会女学的设置,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创举,这使素来被禁止读书识字的女孩也能进入学校学习。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的爱尔德赛女士(Mrs. Aldersay)于1844年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这是五口通商口岸最早成立的女子学校。^②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从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起,截至1860年之前,有确切可考的,仅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六地就开设各式学校有50多所,有学生1000余人。^③除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和宁波女塾外,还有如下较为著名的学校:^④

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为育英书院,其后又发展为之江大学。

1846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在上海开设一所男塾。

1847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Happer)将其在澳门所办的寄宿学校迁至广州,1850年又增加走读小学一所。

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柯林斯(J. D. Collins)在福州创办主日学校。

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收纳灾民,并实施一定的教育,

① Gael Graham: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1995, p. 10.

② 也有该校系“中国最早之女学校”一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记载:

“中国女子学校之设立,创始于1825年,是年一英国女子名格兰脱(Miss Grant)者,始设一教授中国妇女之学校于新加坡。九年后又若有若干英国妇女,组织一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又阅三年,是为1837年,此会中之一传教者亚尔德西(即爱尔德赛,引者注)女士又设一教授中国女子之学校于爪哇。1842年五口通商,亚尔德西女士乃赴宁波,阅两年乃在该处设立中国最早之女学校焉。”(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232页。)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④ 参见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05页;刘志琴主编、李长莉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1页。